

大象
——
学术
——
译丛

[美] 林恩·亨特 (Lynn Hunt) 著

赵辉兵 译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

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

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美] 林恩·亨特 (Lynn Hunt) 著

赵辉兵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 / (美)林恩·亨特著; 赵辉兵译.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7. 4
(大象学术译丛)
ISBN 978-7-5347-8483-5

I. ①全… II. ①林… ②赵… III. ①史学—论文—写作 IV. ①H152. 3②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0911 号

Copyright © 2014 by Lynn Hunt

First published by W.W.Norton & Company, Inc.

Copyright licensed by W.W.Norton & Compan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lephant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2015-A-00000227

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由 W.W.Norton & Company, Inc. 授权大象出版社出版, 未经大象出版社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内容。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

[美]林恩·亨特(Lynn Hunt) 著

赵辉兵 译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牛志远

书籍设计 付铨铨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4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致 谢

与众书相比,本书的写作之旅平添了一份机缘巧合。几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举办的一次研究生会议上,探讨了文化理论的未来。恰巧,德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和多丽丝·巴赫曼(Doris Bachmann)也听了我的演讲。之后,汉斯邀请我参加他在柏林主持的研讨会,并将此次讨论的详细情况刊发在与他素有往来的《历史人类学》(*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杂志上。再后来,我就这一主题先后在意大利的比萨大学(University of Pisa)和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进行了演讲,东道主阿尔贝托·马里奥·班蒂(Alberto Mario Banti)、温齐娅·菲奥里诺(Vinzia Fiorino)和卡洛塔·索尔巴(Carlotta Sorba)说服我将自己的想法以更长的篇幅写出来,以便加入他们的文化史丛书当中,由 Edizioni ETS 出版社负责发行。那一版本——《全球时代的文化史》(*La storia culturale nell'età globale*)——的译者是乔瓦尼·坎波洛(Giovanni Campolo),出版于2010年。在此,我对这么多朋友与同事不断督促我思考这些问题表示诚挚的谢意;当然,我也十分感谢乔瓦尼为此书的翻译所付出的辛勤劳作。

即便如此,我并没有完全沾沾自喜于对文化史前景的演绎。我的很多朋友都应我之请,在百忙中通读了本书的英文版本,以便指出本书所需改进之处。苏珊·德桑(Suzanne Desan)、萨拉·马萨(Sarah Maza)、马西·诺顿(Marcy Norton)、雅克·雷韦尔(Jacques Revel)、索菲娅·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与瓦妮莎·施瓦茨(Vanessa Schwartz)都通读了本书,并提出了许多无比珍贵的建议。尽管我对他们建议的回应并不一定能令其满意,但我希

望他们知晓我十分感激他们能够拨冗帮忙。一路走来,我最终定下来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化史,而是更为恢宏的领域,即文化理论与全球化。在本书的原稿中,我疏漏了很多人名,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帮我校正了这个问题。当然,在这方面没有谁比诺顿出版社(W.W.Norton)的编辑埃米·彻丽(Amy Cherry)所付出的精力更多。她将行文中闪烁其词、矫揉造作或是有点模棱两可的部分统统剔除。尽管看到自己书稿里俯拾皆是的批注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我深知就这本书的可读性而言,她可谓功莫大焉。当然,如若本书依然存在着任何不足之处,责任不在她与任何其他人。

谨以此书献给玛格丽特·雅各布,她分享并塑造了我最近 25 年的生活。

目 录

导 言 史学的变奏	1
第一章 文化理论的兴衰	10
第二章 全球化的挑战	34
第三章 反思社会与自我	62
第四章 新宗旨 新范式	97
索引	124
译后记	145

导言 史学的变奏*

本书篇幅不大,却立意恢宏,即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两大方面的新进展正在重塑史学的版图。一方面,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极大地推动了史学写作的社会文化理论业已大不如前。这导致了未来的史学写作方法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讨论如野葛般蔓延开来,它缠绕于任何决定未来方向或过去意义的尝试之中。全球化会是复兴史学的新理论吗?抑或将扼制其他所有可能的竞争者,只留下一种必然性——在西方模式上的全球现代化? 001

尽管名人传记与大战题材的书籍持续流行,但史学依然处于危机之中,而这绝不仅仅是大学预算的危机而已。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历史何益?”其答案一度似乎是明了的,但现在发现它依然很难回答。在 19 世纪,所有的男 002
学生(只有男性才能上大学)都要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因为这些历史能够给他们未来成为栋梁之才提供指导。哈佛大学 1852—1853 学年大事表(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1852/53)罗列了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录取条件:须通晓代数学与几何学、所有维吉尔(Virgil)的作品与恺撒纪事(Caesar's commentaries)、精选的西塞罗(Cicero)演说与拉丁语语法、精选的希腊文读物以及约瑟夫·E.伍斯特(Joseph E. Worcester)的《史学原理》(*Elements of History*)与《地理学原理》(*Elements of Geography*)中涉及古代史学与古代地理学的部分,同时要具备书写拉丁文与希腊文的能力。一旦被录取,学生们要学习化学、物理学和植物学,同时还要分别学一学期的中世纪史和现代史,而作为核

* 为方便读者阅读,已将原文的尾注改为页下注。为区别原注,译者注用“*”表示。

心课程的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的经典作品要一直学到大学四年级。^[1]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开始担负新的使命,即教导国民。史学强化并在许多情况下创造了国民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学生,特别是中小學生要知晓他们皆属于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过去,即便他们或他们的父母都是移民。1911年出版的一份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关于学校教学的报告中,作者们强调:即便学校只教(!)三年历史课,而反对教四年,也不能以牺牲美国史为代价。“道理很简单:学校的课程设置要给予这些科目[美国史与美国政治]足够的学时,如果一定要删减学时的话,也要拿那些对培养孩子公民责任感不是最佳以及不会立竿见影的科目来开刀。”^[2]随着大学历史教师人数的不断增加,民族国家史(美利坚合众国史,法兰西史等)日益居于主导地位,希腊史和罗马史则逐渐淡出。

各民族国家史*从大众政治与大众文化的兴起中获得了其紧迫性与使命感。不过,所有人都应该接受一些基础教育的观念在美国和西欧生根发芽,那是临近19世纪末才出现的事。1900年,年龄在5~19岁的美国孩子中有一半接受学校教育;到1940年,这一比例飙升至70%;1970年则达到90%。^[3]虽然希腊和罗马的雄辩术可能适用于培养政治精英;但是对那些矿工和穷困潦倒的移民来说,刚入学就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因此,要想把普通百姓纳入民族国家中就需要别出心裁。而民族国家兴起的故事,则能够通过共同的主线将迥然不同的人群凝聚在一起,而不论其族裔、阶级或地区的差别。

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同19—20世纪民族主义的共生关系中,逐渐发展

[1] *A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Harvard College for the Academical Year 1852-53. Second Term*, 2nd ed. (Cambridge, MA: John Bartlett, 1853), p.41. (这份大事表中仅提到了伍斯特的《史学原理》和《地理学原理》,并没有给出完整的参考书目。)

[2]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Secondary Schools: Report to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pp.50-51.

* 原文为“national history”,因“national”具有民族、国家的双重含义,译者将其翻译为“民族国家”;下文中出现的“national narrative”统一译为“民族国家叙事”;不过,将文中的“national identity”则译为“国民身份认同”。——译者注

[3] “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Literac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t http://nces.ed.gov/naal/lit_history.asp (accessed November 4, 2013).

起来。它为许多新国家提供了一份以往一直被限制或忽视的遗产。即便是在最悠久的民族国家里,诸如英国与法国,它也起到了加强身份认同的作用。在初等教育中,历史教学强调本民族国家历史的情形则尤为明显。随着大学教育与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的兴起,中小学历史的主要目的始终都是教导学生,让他们感到自己与其他本国公民都是一家人。以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件事为例,2009年3月19日,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659号议案(Bill 659),“用以加强美国史学与公民学的课程教学”。该议案计划在2010财政年度给中小学拨款1.5亿美元,用以加强“讲授传统美国史的相关课程”。该议案规定的目标就是要解决那些被认为不利于学生们将来成长为美国公民的问题,即对美国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为“美国民主的坚挺与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能否确保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国家的过去有着深刻的理解”。〔1〕

史学被用于维护民族国家统一,这种情形在新近取得独立的国家中尤为明显。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不久,其教育部就起草了一份乌克兰教育改革蓝图,呼吁进行“民族国家教育,其基石就是教育要与民族国家的领土、民族国家历史与传统有机统一、乌克兰民族文化的保存与繁荣密不可分”。自2001年起,基辅的塔拉斯·谢甫琴科国立大学(Taras Shevchenko National University in Kiev)的历史教师开设的所有课程几乎都集中在乌克兰的国家发展上,例如开设的课程有:“世界各地的乌克兰人:历史、文化、生活”“乌克兰原始社会与古代社会发展史”“乌克兰多党制形成的若干问题(20世纪80—90年代)”。〔2〕

民族国家史依然是世界各国历史教学的重头戏。在美国,39%的高校历

〔1〕 关于该美国参议院议案,参看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1s659is/html/BILLS-111s659is.htm> (accessed November 4, 2013)。

〔2〕 乌克兰的改革蓝图转引自 Catherine Wanner, *Burden of Dreams: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Post-Soviet Ukrain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2。基辅的塔拉斯·谢甫琴科国立大学所开设的各部门课程名称源自 <http://www.history.univ.kiev.ua/en/faculty/history-faculty.html> (accessed November 4, 2013)。

005 史教师教美国史。位居第二的是欧洲史,有超过 25% 的历史教师讲授。法国、英国、德国教本民族国家史教师的比例则更高,就德国来说,已接近 50%。正如乌克兰所显示的,痴迷本国历史的情形不止出现在西欧和美国。在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历史教师中的 13 位教授都主攻印度史。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历史教师从事本国史研究的比例要比印度的德里大学低一些,但主攻中国史的比例也超过了半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历史学院里,有 2/3 的历史教师致力于澳大利亚史。^[1]

尽管民族国家史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但情形已经有所改变,而且往往是以一种戏剧性、颇具争议的方式发生着变化。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国家叙事在西欧和美国就受到批判,这种情形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政治史,特别是对政府高层或政治精英行为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形形色色的、受过教育的公众之需求。社会史——对精英圈子之外群体的研究——崭露头角,因为它吸引了那些上大学* 的不同人群的兴趣。1967 年,年龄段为 18~24 岁的 1/3 的美国男性和 1/5 的美国女性是大学生。1988 年,该年龄段女大学生的百分比(30.4%,年龄段为 18~24 岁)超过了男性(30.2%),此后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在 1967 年,年龄段为 18~24 岁的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仅有 13% 是大学生(相比之下,白人为 27%);到了 20 世纪 70

[1] 2001—2002 年期间美国历史教师的人数,参看 Robert B. Townsend, "State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The AHA Annual Department Survey 2001-02,"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April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state-of-the-history-department-the-aha-annual-department-survey-2001-02> (accessed November 4, 2013)。教欧洲史的人数已经平稳下降,教非西方历史的人数开始上升,而教美国史的人数则不变,根据 Robert Townsend, "Decline of the West or Rise of the Rest? Data from 2010 Shows Rebalancing of Field Coverage in Departments,"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Sept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september-2011/decline-of-the-west-or-the-rise-of-the-rest> (accessed November 4, 2013)。在统计中,我把博士后和研究员排除在外。教欧洲史的人数可参看 Peter Baldwin, "Smug Britannia: The Dominance of (the) English in Current History Writing and Its Pathologies,"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20, Special Issue 3 (2011): 351-366。关于德里大学的情况可参看 <http://www.du.ac.in/index.php?id=437&L=0> (consulted August 3, 2012)。北京大学网站的数据不如德里大学网站的详尽。它没有提供此类划分,而且至少有一例是将一位刚刚去世的、享年 90 岁的历史学家列入名单中。参看 <http://web5.pku.edu.cn/en/history/Faculty/> (consulted August 3, 2012)。关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参看 <http://history.cass.anu.edu.au/people> (consulted August 25, 2012)。

* 这里的大学也包括学院,而且以下提到的大学也涵盖学院。——译者注

年代,二者间的差距缩小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因为白人上大学人数的猛涨,二者间的差距短暂地拉大了;到了21世纪的头10年,这种差距又缩小了。到了2010年,数据如下:年龄段为18~24岁的男性上大学的百分比为38%,女性为44%,白人为38%,非洲裔美国人为32%。^[1] 民族国家史的民主化进程与大学的民主化进程是联袂而行的。工人、奴隶、原住民(native)、妇女、少数族群的经历再也不能被漠然置之了。

新社会史之所以会在美国引起共鸣,是因为它对奴隶与移民历史的关注以及大学的迅猛扩张。不过,新社会史发轫于西欧并波及全球,部分原因则在于西欧史学影响了全球的史学写作。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的《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The Parisian Sans-Culottes in the Year II*, 1958)和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就是最好的例子。尽管索布尔和汤普森的目的都是通过凸显下层社会激进行为的故事来改变本国的民族国家叙事模式,而结果却是他们的开拓性研究也启发了别国的史学家。那些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或任何此类革命运动的研究者——都不能忽视索布尔对下层社会激进分子(无套裤汉是指那些不穿代表上流社会的及膝短裤的人)重要性的研究成果。若论汤普森的影响的话,甚至比索布尔还要大得多。一位印度史学家在1997年评论道,“汤普森的作品带有典型的英国风格”,但“其著作风靡全球”,在印度尤其盛行。^[2]

美国社会史的兴起有力地支持了当代劳工运动、女权运动与大量少数族

[1] Table 213, “Enrollment Rates of 18-to 24-Year-Olds in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by Level of Institution and Sex and Race/Ethnicity of Student: 1967 through 2010,”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vailable at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1/tables/dt11_213.asp (accessed November 4, 2013).

* 这部名著国内通行的翻译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此,姜进认为,将“making”翻译为“形成”是错译,正确的翻译是“造成”,即《英国工人阶级的造成》。因为该书作者“强调的是‘制造’这一人为的行动过程,而非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参看[美]林恩·亨特:《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译者注

[2] Rajnarayan Chandavarkar,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E. P. Thompson and Indian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3 (Spring, 1997): 177–196, quote from p. 177.

007 群争取权利运动,进而赋予史学另外一项政治功用:以新近发现的历史上的偏见与歧视为中心,强化被排斥群体的身份认同。不过,这些成功也带来一连串的自身问题。这些新作品的撰写本来是强调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国家叙事,到头来却催生了未来史学写作的方向之争。是将以往被排斥的群体纳入现有的民族国家叙事之中,抑或是将民族国家叙事本身弃之如敝屣呢?^[1]

承认过去发生的诸种排斥行为削弱了关于史学宗旨的共识。史学是用来塑造一个民族国家,还是去解释塑造一个民族国家是何等仰赖于漠视或遗忘那些弃民?史学家的职责是不论预设狭隘或是宏观,都进行一种整合性的民族国家叙事,还是对任何形形色色的此类叙事的诸多缺陷口诛笔伐?史学的本质是叙事还是真理?史学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神话,还是被用来合理化偏见与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先前史学的诸多缺陷现在似乎变成了对史学研究本身的控诉。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许多学者与激进分子开始寻求各种新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其实并不是新事物。史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形塑史学这门学科的过程中,从更具理论倾向的社会科学中借鉴了很多内容。例如,索布尔和汤普森的研究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就有很深的渊源,而且他们的著作不同程度地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贡献。他们力图探究哪些类型的工人最易于组织起来,变成革命派。其他史学家也从社会学理论中汲取了灵感,无论是从法国社会
008 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抑或是他们的徒子徒孙那里。与马克思相类似,他们都各自提供了现代化理论的某种版本,即描述了诸多现代性的鲜明特性、这些特性的形成以及由此将西方社会引向何方。不过,他们都反对马克思。

即便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为史学家的开拓性研究提供了灵感,但他们也开始质疑前者的有效性。索布尔和汤普森的研究成果就是发人深省的例子。他们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问世之时,甚至在马克

[1] 关于这些问题更加详尽的讨论可参看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4)。

思主义者的圈子内,也引起纷争不断。他们用各自的方法关注激进主义者的生活方式与志向,而且特别重视文化方面。这就大大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或经济生产关系范畴的垂青。简言之,索布尔和汤普森揭露了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无视文化——甚至试图修正它。

现代化理论影响下的史学研究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现代性理念本身被认为与西方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理很简单,学者们始终认为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与众所周知的西欧与美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一回事。例如,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并把后者等同于“合理性(rationality)”。尽管韦伯本人对现代市场与国家中的“合理合法的(rational-legal)”权力体制大加挞伐,但事实上“传统的”或非现代的生活方式本身所具有的消极含义不容小觑。依据韦伯的观点,传统的权力体制没有对职权范围(spheres of competence)、非人性化规则(impersonal rules)、井然有序的上下级关系、任命与提拔的常规机制等方面进行清晰的界定。传统是在与现代的对比中,根据其所缺少的东西来定义的。^[1]

集中关注文化为摆脱上述僵局提供了一条出路。而且,伴随着这种新关注,一系列新理论不断涌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各种理论往往强调物质原因与社会学分析;而新的文化理论则关注语言、符号以及仪式,强调意义阐释优于因果分析。例如,解释某些工人造反的原因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去调查工人是如何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的。新的文化理论被纳入名目繁多、易于混淆的标签之中:语言学转向、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或纯“理论”。本书第一章旨在解释这些文化理论何以在那个特定时刻出现、它们的共性以及它们如日中天的声势何以引发了各种有关史学宗旨的新问题。宗旨问题尤为重要,因为新的文化理论鼓励人们质疑史学中能够确立真理的可能性,而且有时会得出如下论断: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其欧洲中心主义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对当下仅具局部意义。

[1]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010 我们一旦对这种转向文化理论的史学得失进行考察,就会不难理解近年全球化何以成为如此热门的话题。林林总总的文化理论有助于轰开在史学宗旨上所达成的共识,但它们终归无法提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可行性方案,以便取代早期的诸种社会理论。全球化就是那种令人难以抵抗的可行性方案之一。尽管它依然给西方以特权,但它讲述的是一个全球故事,而且它复归于各种“宏大的问题”,诸如西方称霸全球的过程与原因。诸多文化理论强调对地方史与微观史的研究,而全球化的讨论与生俱来就重视对跨国史与宏观史的研究。它给予史学新宗旨:在一个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第二章考察全球化范式的兴起及其对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011 不过,全球化并非唯一的可行性替代方案,而且其阐释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尽管全球化可能影响到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其影响不仅是不均衡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极其有限的。例如,全球化或许会把数以百万计的新移民送进美国的小学,但他们如何得到接纳则取决于地方文化、区域经济与全国政治,为了获得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必须对这些情形进行细致的考察。全球化这一参照系并不总是最恰当的。因此,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又回到一些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经典问题上,并对这些问题予以新解。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与“自我”^{*}这对至关重要的范畴。社会与自我的意义往往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指的是美国社会,那么我假定你是知晓我的意思的——但是详加考察,却发现这两个范畴又变得模棱两可了。通过对这种模糊性根源的深入探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些范畴,因为它们仍然是任何社会或文化分析的基础。伴随着对社会与自我的重新关注,就有可能形成许多新史观。这些新史观在挑战其他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同时,也会汲取最近数十年来出现的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中的真知灼见。

根据定义,过去看起来似乎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徒留白云千载空悠悠;然而实际上过去依然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史学家与史学的宗旨变动不居。当我

* “self”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大多时候将其翻译为“自我”,有时出于语境的需要,也将其译为“自性”或“本我”。——译者注

们寻觅历史中的新事物之时——古代政治领袖中的翹楚、民族国家兴起的历程、对特定人群受到迫害与排斥的铺陈、全球化的推进——结果我们总会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原始资料,得出很多预料不到的结论。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史学的脆弱或轻率,抑或是史学家的鄙陋。没有视角,就不能进行观察。史学宗旨的不断演进正是其生生不息的一个标志。每一个新时代都会找寻一种对其当时所处位置的理解,倘若没有历史,那个新时代也就根本不会存在。

第一章 文化理论的兴衰

013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文化理论备受青睐,这是因为它们展现了通常历史写作中所具有的令人折服的历史批判精神。二战结束以来,主要有四大史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年鉴学派以及特别流行于美国的身份认同政治。它们都遭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众多文化理论的攻击。一些人可能会质疑这四大范式是否可以等同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本质分析中所表达的“范式”的含义,也正是他将这一术语传播开来。自 1962 年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问世以来,学者们就开始讨论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及对其他领域的适用性。该术语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是因为它十分好用,所以,我毫不迟疑地使用了该词,当然,读者理应知晓我对该术语的界定。就“范式”而言,我的定义是指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叙述或元叙事。它包括:(1) 014 一个由左右着意义的各要素所构成的等级体系,(2) 这一等级体系进而为研究确立了议程,也就是,影响了被认为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之选择以及适合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路径之运用。^[1]

即便为数不少的学者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抱怨:设若没有独一无二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存在整体性的现代化道路、统一的年鉴“学派”、致力于身份认同政治的特有的政纲,那么这四大范式也都与我的定义相吻合。马克思主义是最易于体认的范式,因为在一个人写的许多著作中,必定存在着一种万变不

[1]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例如,参看 Joseph F. Musser, “The Perils of Relying on Thomas Kuh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8 (Winter, 1984–1985): 215–226。关于范式对转向的讨论,参看 Doris Bachmann-Medick, *Cultural Turns: Neuorientierungen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Verlage, 2006)。